

“十七年”短篇小说的《圣经》叙事模式解读

李 丽

[摘要] 由于意识形态等原因,“十七年文学”不是单纯的文学,而史无前例地承载着太多的重负。作为缔造共和国“神话”重要文本的“十七年文学”,我们能够很轻易地找到这种神话叙事与别的神话叙事,比如《圣经》故事的相似性。而这种相似性又能反过来证明共和国叙事的神话本质。“十七年”短篇小说这一最迅捷、灵活地反映时代风貌的文学样式,与《圣经》,特别是《新约》故事在叙述模式上有很大的相似性。

[关键词] “十七年”;短篇小说;《圣经》;叙事模式

[作者简介] 李丽,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871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 4434(2012)09 - 0070 - 05

“十七年文学”指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 1966 年“文革”开始的文学。这个概念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它和这段共和国史的同构性以及这段共和国史本身的独特性和复杂性。这种独特性和复杂性一来要求这段文学详尽、忠实地记录下这段历史;二来要求这段文学反过来为共和国、为这段历史的正当性提供依据。所谓正当性依据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个共和国,为什么是这个而不是任何其他的国家形态统领着我们,这种国家形态能够为我们带来哪些福祉?文学这一“具有认识功能以及伦理-政治的效果”^{[1](P365)}的艺术形式,必须为此提供依据,从而为共和国奠定坚实的伦理基础。更加重要的是,这段历史里全社会的人力、物力资源是高度集中、高度计划的。要保证合作化、大跃进等一系列宏阔的社会工程能够顺利实施,就必须使大家心向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那么,如何进行情感动员呢?文学责无旁贷。所以,“十七年文学”不是单纯的文学,而史无前例地承载着太多的重负。研究这段文学,就不能从文学本体角度进行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而应仔细考量它为这段共和国史提供了哪些伦理、情感的储备。换句话说,我们应该深究,作为缔造共和国“神话”重要文本的“十七年文学”,在神话叙事中究竟起了哪些作用。卢卡奇说:“概念的神话总是说明人们对他们存在的基本条件,那种他们无力摆脱其后果的条件不理解。这种对对象本身的不理解,

在思想上就表现为超验的力量以神话的形式构造现实,构造对象之间的关系、人同对象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的变化。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认识到‘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他们才获得了清算一切神话的可能性和立足点。”^{[2](P68)}不过,要人们都认识到“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而全国人民对共和国的认同,以及在认同基础上的全国总动员又是那么迫在眉睫,神话叙事就是必要的、合理的,也是可行的。

既然“十七年文学”是共和国神话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就能够很轻易地找到这种神话叙事与别的神话叙事,比如《圣经》故事的相似性;而这种相似性又能反过来证明共和国叙事的神话本质。当然,共和国神话与《圣经》神话的性质、作用是根本不一样的。本文的任务只是仔细解剖“十七年”短篇小说这一能够迅捷、灵活地反映时代风貌的文学样式,与《圣经》(特别是《新约》)故事在叙述模式上的相似性。

—

“浪子回头”(《路加福音》第 15 章)故事中,小儿子带着从父亲那里分得的产业去了远方,任意放荡,不多久便挥霍殆尽。走投无路的他恨不得拿

猪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于是,他幡然醒悟,重回到父亲那里,忏悔道:“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天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父亲非但没有惩罚他,反而抱他,亲他,拿上好的袍子给他穿,宰杀肥牛犊给他吃,因为这个浪子“死而复活,失而又得”了。在基督教的世界中,错误能够改正,罪孽可以宽恕,再决绝、偏狭的浪子也会回头,因为我们总会有温暖、仁慈、宽厚的怀抱可以依靠,有父亲一样的主可以依靠。反过来,主的温暖、宽厚、无限也通过对浪子的宽恕更突出地体现出来。试想,如果没有浪子不断戏剧性地出走和回头,人们都如那个忠厚的长子和父亲生活在一起,生活在沉闷得淤滞的氛围中,父爱如何能够凸现?浪子出走和回头原来不仅是对于耶稣之爱的证明,更是不可或缺的建构。

在“十七年”短篇小说中,我们能够发现许多类似于“浪子回头”故事的作品。或者说,“浪子回头”是“十七年”短篇小说一种极其重要的叙事模式。比如,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讲述了一对被誉“为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的典型”的夫妻进城后,婚姻关系从出现裂痕到最终修复的故事。知识分子出身的“我”对于重回城市的生活感到兴奋和亲切,也越来越看不惯工农出身的妻子“土气十足”的穿衣和走路姿势。“结婚以来,我仿佛才发现我们的感情、爱好、趣味……差别是这样的大!甚至我曾经想到:我们的夫妇关系是否可以继续维持下去?”然而,经过激烈冲突后,“我”终于明白,她看似狭隘、保守、固执的地方,正是“我”所没有的光华。“我”于是带着一颗“后悔”的心,来到妻子面前忏悔:

……我参加革命已经四五年了!可是在我的思想感情里边,依然还保留着一部分很浓厚的小资产阶级的东西!有时候甚至模糊了革命者的立场,这是一个严重的思想问题!而你呢?虽说文化水准、理论知识、工作职位都比我低——这也是真话,可是你倔强、坚定、朴素、憎爱分明……

这一番真情告白从思维模式到情感立场都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知识分子“原罪说”严丝合缝。《讲话》明白无误地宣告:“知识分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干净处,就是身体也不干净,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3]一霎时的精神出轨得到了及时制止,浪子终于回到《讲话》精神的怀抱,“我”也得到了妻子的深情一吻。邓友梅的《在悬崖上》,

亦是“浪子”终于从资产阶级趣味的弯路折返回无产阶级立场的大道,和妻子重建了爱情。

“浪子回头”的喜剧不仅发生在夫妻生活中,也渗透进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之中。高缨的《达吉和她的父亲》里,任老汉和马赫老爹在党的教育之下深切地认识到,彝汉劳动人民“自古便是兄弟”,毛主席是比天菩萨还要神的神。于是,他们不约而同地抛开对于异族的偏见。在这个故事中,不仅仇视异族是歧途,就是对于亲子之爱的过分强调也是歧途。民族和亲情都应该融化于更宏阔的共产主义事业当中去。就这样,“十七年”短篇小说家用一个个“浪子回头”的范例,扬弃了爱情、亲情等一系列相对狭隘的范畴,确立了党、毛主席等更阔大、恢宏、圣洁的范畴,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终于在当时的读者心目中逐步确立起来。更加重要的是,这些“浪子回头”故事都发生在夫妻、父女之间,演变于最基本、日常的伦理领域。当这些关系和领域都被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化以后,人们便彻底完成了意识形态改造,再也没有空白点。“十七年”文学对于世界的重塑是全方位的、销魂蚀骨的。

在奠定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排他性地位后,文学还需要为“十七年”最宏大的社会工程——合作化运动进行情感动员。这项工作显然更加艰巨,因为合作化的对立面是严守私人财产这一人的天性。这项工作也更加必要,因为文学的舆论攻势和情感动员是消融人性坚冰最重要、最有效的武器。于是,“十七年”出现了大批反映合作化运动的短篇小说。这些短篇小说大量运用了“浪子回头”模式,那些不顾合作化的总体性、计划性要求,只看见一己私利的顽固分子就是浪子,而他们无一例外地在合作化政策的感召下回了头。他们的回头比合作化积极分子们如何舍小家顾大家更能说明合作化政策的英明、伟大。合作化政策的宣传几乎都离不开这些浪子们的倾情出演。

西戎的《赖大嫂》描写了自私自利的赖大嫂在副业组长立柱妈等人的帮助教育下“惭愧”了,终于认识到“搞生产,有利没利都得干,只要国家需要,没利也要干”。刘真在《春大姐》中也借老社长赵金山之口道出了村中人思想的转变:“现在土改这么多年啦,要不搞互助合作,不走社会主义的路,一定还要走从前的路。”李准在《不能走那条路》中同样表示:“过去地主是只恨穷人穷不到底,现在大家是互相帮助。……咱不能走地主走的那一条路。”这些浪子以自己从专务私利到一心向公的艰难转变为例现身说法,告诫大家千万不要走

那条路,合作化才是康庄大道。

但是,人心毕竟是趋利的,而且在当时的生产水准之下,衣食还是头等要务,怎么能要求普通老百姓枵腹从公?赵树理深味着这一悖论。作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忠实信徒,他在《锻炼锻炼》中坚定地站在合作化以及拥护合作化的年轻人一边,调侃并竭力丑化“小腿疼”、“吃不饱”等顽固分子,并让这些浪子在年轻人的捉弄和教训下觉得羞愧和恐惧,最终向合作化的大势屈服。但是,“浪子回头”模式在赵树理农民式的直觉中出了问题:浪子回头是自觉的,父亲、主的怀抱也是温暖的;而“小腿疼”、“吃不饱”的回头却是心不甘、情不愿的,甚至是被恐吓的,以杨小四为代表的“父亲”的怀抱也决不温暖。被诡计威逼、恐吓的“浪子回头”怎么能证实父亲的宽厚和温爱?决不宽厚、温爱的父亲,即便是正确的,又怎么能从情感上动员最广大的群众积极投身轰轰烈烈的合作化运动?赵树理无意中揭出了“浪子回头”模式应用于“十七年”文学时无法规避的困境,以及人之本性的顽固。

不仅合作化,我们可以把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看作一项浩大的工程。这项事业同样需要最广泛的情感动员,使人们打心眼里认同它,进而献身于它。“十七年”文学为此作了大量的努力。阎树田的《日出之前》描写了一个悲壮凄美的农奴觉醒的故事。纯朴而愚昧的扎西极尽全力地效忠索朗多杰老爷,为的是让看似公正、慈悲的老爷赐给他一份养生地。妻子的死使他终于明白,解放军才是“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

“十七年”短篇小说中“浪子回头”模式可谓比比皆是,如孙肖平的《摇篮曲》、康濯的《春种秋收》、谷峪的《新事新办》、石果的《风波》、李德复的《“财政部部长”》、郭澄清的《黑掌柜》、萧也牧的《爱情》等。这里就产生出一个疑问:为什么作家都热衷写“浪子回头”?其实,“浪子回头”模式的运用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确立、全无产阶级的情感动员之间的关系又是复杂的,两面的。就连深染资产阶级意识或是执著于一己私情的浪子都能够回头,都能够有一个无限宽厚、温暖的怀抱可以栖息,那个父亲——党和毛主席的恩情真是比山高比水深。浪子这种常规中的例外的坎坷遭际正是对父爱最可靠、最有说服力的明证。

二

王愿坚因为许多作品入选中小学教材而为中

国读者熟知,他的审美取向、思维模式通过体制化的传播,至今仍影响着中国人。他从处女作《党费》开始,便努力表现革命战士为了党的事业,不惜舍弃自己、亲人的利益乃至生命的英勇品质。《妈妈》同样塑造了一个为了革命事业割舍亲子之情的英雄母亲的形象。为了革命事业,不仅亲子是可以舍弃的,就是自己的生命也随时可以奉献。《七根火柴》描写了在红军过草地的艰苦岁月里,一个生命垂危的战士为了能让战友们得到温暖和光明,宁肯咬紧牙关忍受饥饿、寒冷和潮湿,也不愿动用身上珍藏着的七根火柴的故事。七根火柴很小,但它折射出共产党员不惜舍弃一己享乐乃至生命,把一切献给党的高贵品质。至于这七根火柴对于革命事业是否真的那么重要,就不那么重要了。这里的逻辑是,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革命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七根火柴就是七块金光闪闪的试金石啊!

王愿坚把伦理亲情和自己的生命与革命事业对立起来,两者之间激烈的冲突形成了他的作品特有的惊心动魄的美感。但是,冲突只是表面现象,他的逻辑里面,亲情和生命的“邪”总压不了革命事业的“正”,结局几乎一猜即知,这就造成了他的作品的模式化。再往深处说,模式化正是意识形态宣传所需要的。模式化的流水线只会产出合乎标准的产品,却不会产出个人化的异端来。但是,那么多亲人生命的抛弃,只是流水线上的一个环节而已,生命是否太轻,亲情是否太脆弱了?

王愿坚的模式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深厚的人类信仰史根基。《马太福音》第10章记载了耶稣告诫十二门徒的教义:“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门徒。”是否勇于抛弃对于父母、儿女的亲情,背上属于自己的十字架,是考验你是否信靠上帝的试金石。但是,我们仔细研究就会发现,耶稣告诫强调的是你的伦理亲情是否“过于”对上帝的爱,对上帝的爱并不是排他的。《创世记》第22章载,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第二天清晨,那个人备上驴,劈好燔祭的柴,带着儿子,往神指示的地方去。“旧约”同样把对上帝的爱与亲子之爱对立了起来。但亚伯拉罕抽刀杀儿子时,天使制止了他,并用一只两角扣在稠密的小树中的公羊代为牺牲。一切只是考验,并不要求真的牺牲。于是,我们

可以认定,王愿坚模式与《圣经》里爱主胜过爱父母、儿女的教训相仿佛,对革命事业的爱与对主的爱都是至高无上的,这种爱甚至以贬抑亲子之爱为前提,只是王愿坚要残忍、独断得多。这或许就是革命斗争的需要?

不仅在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中盛行王愿坚模式,现实题材中抛弃亲情甚至生命跟党走的小说也层出不穷。张天民的《路考》中,驾训主考官老梁为儿子监考驾驶,但他毫不徇私枉法,“坐在驾驶室里,父子俩全然不像父子!一个紧张得脸上出油;一个皱着眉、板着脸,使劲儿想着出个难题”。他是一个爱社会主义事业胜于爱自己儿子的表率。当他得知儿子出了交通事故后焦虑万分,但他的焦虑别出一格:受伤的“如果是儿子,那还好说;如果是附近的农民,那就更糟!”在社会主义事业的宏伟蓝图中,最无关紧要的就是自己和自己的亲人了。郑秉谦的《柳金刀和他的妻子》、周立波的《山那面人家》、方之的《出山》、段荃法的《“状元”搬妻》、刘绍棠的《大青骡子》、杜鹏程的《年青的朋友》《延安人》、林斤澜的《新生》、菡子的《万妞》等等,莫不是叙述了一个又一个爱社会主义事业胜过爱一切的事迹。

三

《马太福音》第4章“耶稣受试探”这样记载:

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进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出的一切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但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事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

食物、尊严、荣华都是人之所欲,却是圣人的禁忌。

耶稣之所以是基督,就是因为他果断、冷静地拒绝了这些欲望,并把它们归之为魔鬼的试探和引诱。于是,成为圣人就是一场与人性欲望的旷日持久的战争。不过,更加重要的是,圣人之所以能够成圣,是因为只有他们能够抵御魔鬼试探。没有了魔鬼试探,圣便无从说起了。魔鬼原来是圣人修行不可或缺的建设性因素。我们甚至可以说,魔鬼是耶稣的背面和影子,两者是相反相成的。

“十七年”短篇小说在塑造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英勇无私的圣人时,屡屡使用了魔鬼试探的模式。正是在无数宵小的不断捶击之下,一块块无产阶级的好钢才被锻造出来。宗璞的《红豆》是最典型的魔鬼试探模式。齐虹那“清秀的象牙色的脸”,那“迷惘的做梦的气息”很自然地就捕获了江玫年轻的心。尽管他们属于不同的阶级,在人生观和价值取向上有着本质的区别,但他们却又偏偏爱得那样炽热而浓烈。江玫虽说意识到了这一点,“可是她并没有去多想这个,她只欢喜和他在一起,遏制不住地愿意和他在一起”。但是,为了信念,为了真理,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幸福,也为了不愧为革命的后代,江玫最终舍弃了“像碎玻璃一样割着人的爱情”,拒绝与齐虹一同去美国享受奢华的资产阶级生活,成了“好的党的工作者”。需要注意的是,魔鬼试探是双刃剑。试探越是击中人心,越是难以抵御,就越能显出抵御者的勇气和决心,抵御者也就越是能够成圣。但是,欲望本已如此迷人,你再不吝笔墨地去铺排它,不就成了对邪恶欲望的宣传?所以,江玫的抉择貌似坚定,她对柔情往事的回顾却已说明了她对这段感情的沉湎,沉湎无形中消解了抉择的坚定。姚文远批评宗璞的感情“完全被小资产阶级那种哀怨的、狭窄的数不尽的个人主义感伤支配了”^[4],实在合乎那个时代的逻辑,也切中了魔鬼试探模式的“弊端”。

在李威仑的《爱情》中,对异性本真的爱恋和吸引成了爱情问题上最需要避开的“魔鬼”。叶碧珍对自己心爱的,但此时已经接受了别的姑娘的周丁山说:“我应该克服的感情,我已经克服了。为了你的幸福,为了你们的幸福,我很高兴……”虽说她心中明明知道,“他不是不愿意爱她,而是不能够爱她”。但是,为了不让良心犯罪,她还是克制住了这种“几乎不能克制的感情。这是为了什么呢?这正是为了爱情——一个青年团员、一个真正的医生,对人民,对自己的职业,那深厚的、真挚的爱情。还有什么样的爱情,会比这更崇高、更美丽呢?”就这样,叶碧珍和周丁山都抵御住了真情的

诱惑,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圣人。其他如丰村的《美丽》、王杏元的《“铁笔御史”》、陆文夫的《二遇周泰》、马识途的《最有办法的人》、赫斯力汗的《起点》、阿章《寒夜的别离》、浩然的《蜜月》、《新媳妇》、秦兆阳的《一封拾到的信》等短篇小说也属于典型的魔鬼试探模式。

除了上述三种叙事模式外,还有许多《圣经》叙事模式都可以在“十七年”短篇小说中找到明晰的对应。比如,《启示录》营造了一个美妙的“新天地”:魔鬼被击败,并“被捆绑一千年”,“使它不得再迷惑列国”;神与人同在,并且“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新天地”与黯淡、邪恶的旧世界形成了强烈比照,正是这比照使得基督王获得合法性,更是这比照使得人们一刻也无法窒息于旧世界,迫切渴求基督为王,给人间换来春色一片。为了宣传、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十七年”短篇小说大量运用了《启示录》模式,竭力铺排“旧”中国的惨绝人寰,泼墨“新”中国的欣欣向荣。

就在不断的忆苦思甜中,“新”中国成为融化进每一国民血液的真切体认。汪曾祺的《羊舍一夕》描写了几个孩子在党无远弗及的阳光照耀下,经历过“旧”时代的风风雨雨,将会迅速、结实、精壮地成长起来。小说结尾处,“他们都睡了。灯已经灭了。炉火也封住了。但是从煤块的缝隙里,有隐隐的火光在泄漏”。温暖、柔和的火光正是“新”时代最贴切的写真。因此,这篇小说看似冲淡,却和十七年整体氛围相一致。笔者甚至认为,这种冲淡纯美的境界正是“十七年”最需要、最理想的状态。看来,汪曾祺还是深谙“十七年”的三昧的。

新旧世界的比照不仅存在于新旧中国之间,还存在于“新”中国建设的历程中。因为“新”中国建设是一个不断地扬弃旧我、走向新我的旅程,或者说,革命得以生生不息有赖于《启示录》模式不间断的应用。比如,西戎的《宋老大进城》极力铺写宋老大们入社后的殷实、和谐,单干户王发祥的处处碰壁、捉襟见肘,并在比照中告诉我们,入社前后实在是新旧两重天,合作化是一场不亚于1949年之前的伟大革命。小说结尾,宋老大以新世界老居民的优越心态对王发祥说:“别的路走不通,绕来跳去,还是得走这条路!哈哈……”还有比这更

移动人心、耸动听闻的情感动员吗?其他如艾芜的《野牛寨——南行记续编之一》、陈桂珍的《钟声》、骆宾基的《山区收购站》、刘真的《英雄的乐章》、欧阳山的《金牛和笑女》、赵树理的《田寡妇看瓜》等,都是《启示录》模式的经典运用。

当然,《圣经》叙事模式在“十七年”短篇小说中的应用并不是相互排斥、泾渭分明,而是相互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比如欧阳山的《金牛和笑女》既是《启示录》模式,也可看作浪子回头模式的反证——笑女这个浪子终究没有回头,因此不得善终。多重模式的叠合式应用,使得这些小说对于共和国政权伦理基础的奠定和情感的总动员起到了事半功倍的功效。

四、结 语

“十七年”是全面的集体主义时代。按照哈耶克的说法,集体主义时代“一切宣传都为同一目标服务,所有宣传工具都被协调起来朝着一个方向影响个人,并造成了特有的全体人民的思想的‘一体化’”^{[5](P146-147)}。“十七年”短篇小说作为重要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宣传工具,对于促成全民“一体化”可谓功莫大焉。而这些小说之所以能起如此功效,离不开作家们对“浪子回头”等《圣经》叙事模式的熟练应用。意识形态宣传和宗教教义有深层的契合处?当然,笔者并不是说“十七年”作家们都熟读了《圣经》,但是,当他们与宗教家有着相同的出发点和目标时,叙事模式的雷同当是情理之中的事。

[参考文献]

- [1] 特里·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 [2]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 [3]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N].解放日报,1943-10-19.
- [4] 姚文元.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和创作倾向[J].人民文学,1957,(11).
- [5]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戴庆璋]